

K203
206

中国文化精神 的现代使命

司马云杰 ● 著

——关于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与核心价值观的研究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文化精神 的现代使命

司马云杰 ● 著

——关于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与核心价值观的研究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使命：关于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与核心价值观的研究
/ 司马云杰著.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 1

ISBN 978 - 7 - 5440 - 3314 - 5

I. 中… II. 司… III. 传统文化 - 研究 - 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0158 号

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使命

——关于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与核心价值观的研究

选题策划 李 飞

责任编辑 孟绍勇

复 审 刘立平

终 审 荆作栋

装帧设计 王耀斌

印装监制 贾永胜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印 装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

开 本 787 × 960 1/16

印 张 26

字 数 458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440 - 3314 - 5

定 价 50.00 元

自序

白乐天曾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我在完成《心性灵明论》一书之后，曾说“一切功利之求，皆不值得耗费时间与生命”，要“紧紧地围绕着大道哲学体系进行研究写作”。但人是很难脱离时代而为文的。现在，中国正处在一个复兴与崛起的巨大转折点上。在这个转折点上，中华民族需要什么，渴望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和民族？历史赋予了它什么样的使命？中华民族过去的命运以及现在、未来的方向是什么？它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历史道路实现现代化？如此等等，不仅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也是我日夜萦怀于头心的思考。在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与崛起中，不仅有它独特的文化精神基础，更需要一个新的明确的理念，一种共享的文化精神与价值观。《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使命——关于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与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一书，就是为了研究这种精神基础，提出这种新的理念，使整个国家民族获得共享的精神与价值观而进行研究写作的，其目的是为国家民族的现代复兴提供一种新的文化历史哲学。

实现现代化以及整个国家政策的制定，无非根据两条：一是不断变化的情况；二是永恒不变的存在。整个外部世界是驰骛不息、变动不居的，因此，总要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总结新的经验，以便通变化裁，趋时利用。但外部世界不管怎样变化，对于一个国家民族来说，总有永恒不变的东西。这永恒不变者，一是人心人性；二是国家民族的根本文化精神。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历史、生态环境，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人的道德本性与国家民族的根本文化精神并没有多少变化；而这恰恰是国家民族社会历史本质的规定性，是现代化政策制定最为不可忽视的根本存在。知此者，可以大制不割，静推天下之理；而不知此者，不研究这种本质的规定性，只于驰骛不息、变动不居处下工夫，即使研究进行得再

快，也赶不上外部世界的瞬息万变，以此短暂浅薄的经验研究为根据制定现代化政策，只能使国家民族陷入盲动。只有研究人的永恒不变的道德本性，才能为开万世太平奠定始基；只有研究中国几千年根本文化精神与核心价值观，才能为国家民族现代化提供社会存在的精神基础。我的整个研究就是围绕着这一中心思想进行的。

本部论著共有十章，前五章研究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与核心价值观的产生、发展与深层结构；后五章则主要研究中国文化哲学精神的道德理想与价值追求。由于本课题是紧紧围绕着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及其现代使命与大用进行研究写作的，故最后成书题为“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使命”，而副题为“关于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与核心价值观的研究”。

本书的研究与写作，除了对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与核心价值观进行了历史性的描述，把它梳理概括为“刚健、中正、仁义、和平”的基本内容，并对它进行了现代阐释之外，还以大道哲学本体论为根据，对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复兴的新的文化历史哲学，在学术上进行深沉的思考与探讨。自然，这种思考与探讨是紧紧围绕着中国文化的理想与价值追求进行的，但我还是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与见解。例如关于中华民族天德王道的政治理想就是这样。我不仅对天德王道的理想进行了现代阐释，并明确指出，它的整个社会关系与历史存在，应该建立在“仁与义”的基础上，而不应该建立在利益纷争的基础上；中国的现代化应该走一条刚健、中正、仁义、和平的道路，而不应该像现在的西方那样走一条霸权的道路；并把中国古代民主精神与西方现代民主制度进行了对比性研究，认为与西方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民主制度不同，中国应该以人性善良为基础，发展与德治礼治相统一的人类发展高级阶段的政治民主形式与制度。

中华民族致太平盛世的社会理想也是这样。现在提出建立和谐社会，这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相比无疑是一个进步。但要建立和谐社会谈何容易！如果提不出建立和谐社会的最高哲学本体论根据，只浮游于社会层面作一些矛盾调适，恐怕就会平衡于东，失衡于西，按下葫芦浮起瓢，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甚至会最终流于口号与空谈。可知要想实现中华民族建立太平盛世的理想，解决建立和谐社会的最高哲学本体论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在本书中不仅论证了致太平盛世的生命安顿、人性论基础、重建伦理道德体系及礼义之教不可废等一系列问

题，而且以中国大道哲学的至刚、至正、至和之道，为建立和谐社会提供了最高哲学基础。

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追求饥者一饱、渴者一饮，以小私有者为自足的民族，而是一个知天知人，彰大理，循大变，无往不通的民族，是经纶万物，驾馭群品，与造化同功，创造盛德伟业的民族；同样，中国文化也不是抛弃大道哲学，以私有制或“家天下”为最高理想的文化，而是一种乘天地之正，尽万物之性，大化流行，创造不息的生命哲学，一种畅乎物宜，适乎民愿，支撑整个国家民族功加于时、德垂后世，建立盛德富有大业的哲学。因此，论证建盛德富有之大业的文化理想，阐明它建立与存在的哲学基础，也是本部论著不可回避的文化历史哲学问题。因此，我在书中不仅提出了“有盛德而后才可定富有之大业”的论断，而且研究了它建立与存在的社会文化历史根基问题；并认为中国欲建盛德富有之大业，应该走一条蓄养积累的道路，而不应该走西方那种消耗靡费的道路。走西方消耗靡费的道路，中国无异于自杀，是绝不会成功的。中国要建盛德富有之大业，不仅要日新盛德，更要不断地蓄养与积累。蓄之大则大，蓄之小则小。

中国要实现现代复兴，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或者说，通过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历史道路实现现代复兴呢？现在许多人向往着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但现在西方所实行的政治经济制度乃是霸道经济制度，而不是王道经济制度。中国要实现现代复兴，难道就要建立这样一种霸道经济制度吗？那实在不是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理想！因此，我在本书中认为，中国应该实行一种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即新的王道经济制度。我之所谓“新王道经济”，乃是指把儒家天德王道的理想变为现实，使之成为现代新外王经世致用的经济思想与为治之道。它是指在现代社会历史条件下，新外王经世致用的大经济思想。这种新王道经济，虽然仍然是以内圣之德为根据的，属天德王道的大经济思想，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又表现为许多新的思想内容、新的历史特点。我在《新王道经济与现代伦理精神》一章，不仅论证了新王道经济的性质与哲学基础、实行新王道经济的为治大理与经济法则，同时也阐明了实行新王道经济的新的思想、新的特点；并且认为，要实行新王道经济，就必须建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现代伦理精神。这种精神，与西方从新教伦理引出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完全不同的。它应该是从中国大道哲学的最高存在引出的精神，是以至诚不息为天职，以仁义

之道行天下，以刚健中正之道协和万邦，以浩浩大化知觉主宰处为最高性命之理的精神。

本书题为《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使命》，自然应该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明确的回答。我在书中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复兴与崛起，除了它的社会经济基础，还必须有一个文化精神基础。中国的现代复兴，首先是精神复兴；没有精神上的复兴，就不能最终实现中国的现代复兴。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现代复兴，虽然要吸收、融合世界各民族人民的优秀文化，但若就其根本性质而言，它是沿着中国文化根本理念所实现的复兴；离开了中国的文化理念，就根本谈不上中国的现代复兴了。这不仅是一个现代化的精神基础问题，也是一个国家民族社会历史本质的规定性，一个历史的内在目的论存在。中国的现代复兴，是以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觉醒为其根本前提的。这种觉醒从明末算起，已经经历了三百多年了。我认为，对中国现代复兴，与其想得简单点，不如想得复杂点；与其想得短一点，不如想得长一点。因此，我在书中提出了“三百年觉醒，三百年复兴，三百年创造”的论断，并对如何重塑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知识分子在现代复兴中具有怎样的历史地位与使命等进行了一系列论述。“三百年觉醒，三百年复兴，三百年创造”的论断，也许保守了一点，但我想，过分地乐观，可能不太符合社会历史现实。

凡此种论述，皆是围绕着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围绕着大道哲学的文化理想与价值追求进行的。我写这些篇章，并非曲学阿世，而是讲中国文化精神本身的理想与追求。不写这些理想与追求，反而忽视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与博大。试想，如果不写这些文化理想与道德追求，只停留于器物象数，或在思想上被物蔽形役，卑卑琐琐，而不知有大道哲学，如何能写出中国文化那种“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的精神呢？如何能体现其“日新之谓盛德，富有之谓大业”的理想呢？如何能够揭示其“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应乎天，顺乎时，雷行天下而无妄的真理性和“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的天道至德呢？至于说能不能实现这些文化理想与道德追求，那要看有国有天下者能不能实行天德王道，要看现代新外王的精神世界是否具有内圣之大德，自然，也要看整个中华民族文化觉醒及精神世界所达到的理想高度。中国文化之理想，亦我之理想也；中国文化之追求，亦我之追求也。因此，本书最后五章，特别是《新王道经济与现代伦理精神》一章，乃我之最为属意者也。

这些理想，这些文化精神与价值观，看似只是中国的文化历史经验，只是中华民族往日的理想与追求，然若就中国文化根本精神“渊渊其渊，浩浩其天”的存在来讲，就大道哲学“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来讲，它所讲的并不只是狭隘的民族文化经验，而是具有普遍法则与真理性的。大道哲学，乃是天地万物一体之学，或万物一理之学。它所体现的普遍法则与真理性，所具有的普世精神，实乃是天下之学。其为天道至德之大用，不仅明明德，止于至善，可以用来修身、齐家、治国，更可为天下开万世太平。特别是面对着今日霸权之世界，总结中国文化致太平盛世、建盛德富有大业的历史经验，实行新的王道经济，不仅对中国实现现代复兴和现代化具有巨大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而且对于世界文化历史进程来说，也是充满现实感，应该发挥积极影响的。

本书研究所涉及的这些文化历史哲学思想，也是我这些年经常思考的学术理论问题，在我的其他著作中作过不同程度的论述，有些内容甚至直接来自我这几年讲学的讲稿。既是讲学讲稿，总是讲自己研究的成果与内容。因此，本书有些地方直接引用了自己过去的著作。凡此，我皆在书中注出，以备读者查询参阅。但这并不只是简单的重复，凡其所引语言文字，皆是服从于本书思想内容与理论结构体系的。另外，《道德重建要寻求新的人文精神》、《大道哲学·文化历史与国家盛衰》两篇文章，也是与理解中国文化根本精神和核心价值观相关者，故也附于书后，一并供读者朋友参考。

这几年，不少朋友劝我把书写得通俗一点。我很能理解这种要求的合理性。但说实在话，不论是《大道运行论》、《绵延论》，还是《盛衰论》、《心性灵明论》，我几乎是每写一本书，就换一套语言；不然的话，就无法表达每一本书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与精神境界。试想，能用《大道运行论》的语言去描述《绵延论》中纯精神的绵延吗？能用《盛衰论》的语言去论述《心性灵明论》中的灵明心性吗？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用《心性灵明论》的语言去写《盛衰论》，恐怕也是不行的。每一本书都有它独特的思想内容与精神境界，也都需要有一套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去表现它；换一套语言，换一种表达方式，就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很佩服一些人写通俗读物的本事。但研究中国文化，特别是研究中国几微幽深、高明悠远的哲学精神，要想用粗浅的语言去描述那穷神知化、深邃奥妙的存在，实在是很难办的

事。中国文化是几千年的陈酒，而不是矿泉水，想着用随意的解读或戏说去勾兑它、稀释它，实在是办不到的事。文章天下事，得失寸心知。我写此书时，虽然欲尽力以明白无误的语言讲述所要表达的内容，但如果仍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那也就只能怪我笔拙，请读者朋友原谅了。不管怎样说，书是写完了。在此书出版之际，对那些关心我著作的读者及支持我研究写作的社科院社会学所、老干部工作局的诸位朋友，我要表示诚挚的谢意。序此志此。

司马云杰

2007年10月7日于花家地淡泊居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章 何谓中国文化精神	1
一 定义：精神与核心价值观	2
二 论大道哲学与中国精神	7
三 论大道哲学的根本精神	12
四 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21
第二章 中国文化精神的创造与发展	27
一 关于中国文化精神的源头问题	28
二 广阔深远背景与大道哲学思维	32
三 中国文化早熟与纯粹精神发展	44
四 隐退上帝，走向道德形而上学	49
五 文化精神内化与核心价值观念形成	55
第三章 论儒道两种文化与两种精神	62
一 中国儒道文化的源流	63
二 两种哲学与两种精神	66
三 两种精神的文化哲学根源	75
四 两种精神的互补与历史担当	84
第四章 论精神的心性本体论阐释	90
一 论心性本体与精神创造	90
二 论“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	95
三 论起经纶与成德色	100
四 论“精神还仗精神觅”	108
五 论“心之精神是谓圣”	114

第五章	论高深层价值观的建构与大用	124
一	论高深层价值观的结构层次	125
二	论太和之道与至和之德	130
三	论“皇建有其极”	135
四	论“主静立人极”	144
五	论“存天理”与“致良知”	153
六	论高深层价值观的全体大用	160
第六章	论天德王道的政治理想	166
一	论天德王道理想源于天	167
二	论“内圣外王”之道	172
三	论“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181
四	论刚健、中正、和平之道	188
五	论中国古代的民主精神	196
第七章	论太平盛世	208
一	太平盛世：定义与理论	208
二	论太平盛世的生命安顿	213
三	论太平盛世的人性论基础	220
四	论太平盛世的彝伦大法	226
五	论致太平要贞正人心	235
六	论致太平礼义之教不可废	243
七	论不可粉饰太平	250
第八章	论建立盛德富有之大业	254
一	论盛德富有大业的哲学基础	255
二	论有盛德而后定富有大业	260
三	论建立盛德富有大业的根基	264
四	论盛德富有大业的蓄养之道	270
五	论日新盛德与富有大业	274
第九章	新王道经济与现代伦理精神	280
一	何谓新王道经济	281
二	新王道经济的哲学基础	289
三	新王道经济的为治大理	296

四	新王道经济与现代伦理精神	310
五	何谓中国现代伦理精神	316
六	如何建立现代伦理精神	325
第十章	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使命	333
一	中华民族三百余年的觉醒	334
二	中国现代社会存在的精神基础	339
三	中国现代复兴首先是精神复兴	344
四	沿着中国文化根本理念实现现代化	350
五	重塑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	356
六	论知识分子的地位与历史使命	365
附录一	道德重建要寻求新的人文精神	379
一	道德重建要超越浅薄的知识论哲学	380
二	发展人文科学要以人的永恒心性为基础	384
三	寻求新的人文精神离不开形而上学	389
附录二	大道运行、文化历史与国家盛衰	393
一	关于大道哲学的研究	393
二	国家民族与文化历史	395
三	大道哲学与历史盛衰	399
四	大道哲学与文化复兴	402

第一章 何谓中国文化精神

现在，中国正处在一个复兴与崛起的伟大转折点上。我们在这种复兴、崛起中需要什么，渴望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和民族？历史赋予中华民族什么使命？中华民族过去的命运以及现在、未来的方向是什么？它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历史道路实现现代化？应该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应该带给世界怎样的文明并影响于世界？如此等等，都需要一个明确的新理念，需要一种整个国家民族都能够明确、接受、共享的文化精神与价值观。能不能提出这个新理念，提供这种精神与价值观，不仅关乎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及在世界上的地位，而且涉及整个中华民族复兴与崛起的理论根据。

怎样提出这个新的理念，提供这种精神与价值观呢？无疑要吸取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历史经验，但若只是在“全盘西化”上团团转，恐怕是不行的，只有深入到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历史中才行。因为中国现在的复兴与崛起，是内在于它的文化历史的，是其几千年文化历史存在、绵延的继续。因此，中国的现代复兴与崛起，只有中国文化才能进行这种担当。现在，国家虽然日益强盛，然而在文化上，到目前为止还仍然提不出一个新的理念，提不出一种国家民族都能明确、接受、共享的精神与价值观，以便为其现代复兴与崛起提供理论根据，并指导历史实践。目前现实生活中所以出了一大堆问题，如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危机以及腐败堕落等等，究其原因，就是我们在文化上缺少一个明确的新理念，缺少一种国家民族都能明确、接受、共享的精神与价值观。而这种理念、精神与价值观所以提不出来，就在于我们对中国文化哲学的根本精神和核心价值观缺乏系统的研究与分析。

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世界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皆有自己最根本的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如以东西方论，有欧洲精神与亚洲精神；以历史上不同国家民族论，有希腊精神、罗马精神、印度精神、俄罗斯精神、德国精

神、法国精神、日本精神等；以不同宗教论，又有佛教精神、伊斯兰教精神、犹太教精神、基督教精神，其中基督教精神中又分天主教精神、新教精神、东正教精神。这种精神和价值观，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文化理念，也不是某个社会历史时期流行的价值观念，而是以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哲学形上本体论为根据，长期发展起来的根本理念与精神。它不仅支配着不同国家民族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价值取向，而且贯通其文化历史的始终。因此，（1）它表示着一种永恒绝对的精神；（2）它支配着不同的信仰和信念；（3）它从文化上奠定了不同的人性论基础；（4）它维系着一种历史的内在目的论；（5）它内在的规定着不同国家民族历史的存在与发展。

那么，什么是中国精神呢？这种精神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什么呢？它作为中华民族的信仰和信念，奠定了怎样的人性论基础，维系着怎样的历史内在目的论，并规定着国家民族复兴与崛起的历史存在与发展呢？关于中国文化精神的研究，前人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也有很多远见卓识，但对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念这一根本理论问题，却没有给出真实、确切的回答，更未涉及历史发展的内在目的论问题。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乃至七千年文化历史的国家民族，由于文化凝聚与历史积淀很深很厚，因此有着巨大的内涵。不回答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不能揭示这个内涵及其文化历史本质，不能找到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存在，不能说明中华民族特殊的历史使命与发展道路，自然也不能为其现代复兴与崛起提出新的理念，提供国家民族都能明确、接受、共享的精神与价值观。要回答这些问题，要揭示中国文化历史的巨大内涵与本质，自然首先必须研究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念。而在作此研究之前，我们弄清“精神”、“核心价值观念”一类范畴概念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一 定义：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念

一切所谓精神，皆是指人的生命精神。但是，不论是个人的精神，还是国家民族的精神，皆不是在心理本能上讲的，不是在本能的欲望、目的、要求、动机及情感、情绪上讲的，而是在文化上讲的，在哲学本体论上讲的，在形而上学的思想境界上讲的。因此，精神不是物质的派生物，不是某种心理本能的东西，也不是政治宣传、新闻炒作，更不是社会集团利益的辩护书或时代风气的装饰品，而是人凭着虚灵不昧之心，不断地追求法则、秩序及美好的事物，超越自我生命及本能存在，所获得的真理、正义、和谐、美好等思想，或所达到的种种道德境界。因此，精神不是物

质的派生物，不是欲望、目的、动机及情感、情绪一类本能心理，而是超越这些所获得的和谐、美好、仁爱、至善、大公、无私等等的思想境界。

因此，精神总是和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总是和人的教育或教化联系在一起的。“自然人”没有精神。一个孩子刚生下来，也没有精神。他虽然也有本能的欲望、目的、情感、情绪，但这都不能算精神。即使他生下来就具有先天道德本性，那也不能算作精神。只有经过教育或教化，将这些欲望、目的、情感、情绪等等向上提升，或者如黑格尔所说的，必须经过一定的阶段，抽掉欲望、冲动、意愿的具体利害之情，达到无所需要的需要，成为纯粹的思维时，才是精神的存在。^①而其先天道德本性，也只有经过天道义理的涵养、扩充、大化，达到神圣、美好、至善的境界，才能发展出精神。因此，一切精神，皆是文化精神，皆是教育或教化的精神，皆是心理本能上升到无我无欲、大公无私等思想高度所获得的思维形式。个人精神如此，国家民族精神也是如此。不过国家民族精神是在长期的群体参与互动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是由其长期文化教育或社会教化过程发展出来的。它是一种国家民族的精神生活，一种包括信仰、信念、伦理、道德、价值观等等在内的文化精神的统一体，它不仅表现在个人与社会群体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及性格、作风、品德、价值取向上，而且体现在他们的风俗、礼仪、文化制度等方面。但它主要是体现在人的身上，因为人不仅是文化精神的载体，更主要是它的主体性存在。

正因为精神是和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是和人的文化教育或教化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不同的国家民族才有不同的文化精神，才有欧洲精神不同于中国精神、印度精神不同于俄国精神等等。也正是在文化精神的意义上，胡塞尔说“英国的版图、美利坚合众国等等都属于欧洲，而因纽特人、乡村市场上的印第安人或者一直在欧洲流荡的吉普赛人则不属于欧洲”，因为“欧洲这个称呼指一种精神生活和一种创造性的统一体——包括它所有的意图、兴趣、关怀和烦恼，包括它的规划、机构和制度”。^②

正因为人是文化的存在、精神的存在，所以人的生存、国家民族的生存才依赖于文化与精神的生存，而社会历史的存在，也才不是自然史，不是逐物史，而是文化史、精神史。每个国家民族都有长期的文化历史，有着不同的文化精神与独特的历史道路。因此，其为社会历史，也皆具有不

^①黑格尔：《逻辑学》，第2版序言，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

^②胡塞尔：《欧洲人的危机与哲学》，《胡塞尔选集》，第946页，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同的精神本质。承认社会历史的这种本质，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承认这种本质，把人看成文化的存在、精神的存在，才能尊重人，尊重人的文化价值与精神价值，才不会把人当动物、当畜生看，去压迫他、奴役他、驱使他、征服他、占有他，甚至宰割他。而若把社会历史当做自然史，当做生存斗争史，或者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引进人类社会，通过优胜劣汰与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把这看做自然合理性的存在，那么，人也就不能成为主体性存在、文化精神性存在，获得任何尊重，而只有去压迫他、奴役他、驱使他、征服他、占有他，甚至宰割他了。那样，人的存在也就没有什么文化精神价值，人类史也就变成动物史了。

精神不仅和文化、教育或教化联系着，更和形而上学存在联系着，和宇宙本体论的某种神圣存在联系着。例如印度文化精神总是和“梵天”大神的存在联系着，而其精神，是一种梵天精神或“梵我如一”的精神；西方文化精神总是和“逻各斯”或上帝的存在联系着，表现为一种“逻各斯”精神或上帝的“拯救”精神。其他像犹太精神、俄罗斯精神，也都是和他们宗教信仰的最高存在联系在一起，和他们的宗教对上帝的解释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上帝或神一类本体的存在，虽然在宗教上转向了内心世界，从“内在激情”或“终极关怀”上说明其存在，但其在原始意义上，都是和神圣奥秘宇宙法则、秩序联系在一起的。“梵天”、上帝或“逻各斯”等，不仅作为本体大原具有生化宇宙万物的大用，而且具有大公、无私、仁爱、至善、和平等等美好品质。这实际上是人对宇宙法则秩序的一种价值思维抽象与肯定，是人赋予神圣宇宙法则秩序的一种伟大品格。人一旦和天相通，和宇宙相通，也就把自己的内心世界提升到天的高度、宇宙的高度。和天合德，谓之天德。相信宇宙神的存在，和宇宙神在一起，并以此建立信仰信念，使内心世界提高、升腾到宇宙神的高度，即提升到形上本体论的高度，具有天之德，具有宇宙神的大公、无私、仁爱、至善、和平等美好品质，那也就是人的精神世界。人的欲望、目的、动机及情感、情绪等等，只有上升到这个高度，上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才能成为精神，才属于精神的范畴，例如宗教情感、宗教情绪等等。

正因为精神和形而上学联系着，和宇宙本体论的存在联系着，不论它是作为宇宙永恒的法则，还是作为宗教的内心信仰与信念，在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历史的存在中，都具有一种永恒的性质，属于一种永恒的精神。这种文化精神是很难改变的。不论是印度的“梵”文化精神、以色列的犹太教精神、阿拉伯民族的伊斯兰教精神，还是西方的基督教精神、俄罗斯的东正教精神等等，都是很难改变的，它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

将存在于他们的文化历史中，构成其特殊的文化历史本质。

所以如此，不仅在于他们的文化历史贯通一种永恒的精神，更在于它包含着一种核心价值观，一种根本的价值取向。所谓核心价值观，就是贯通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历史的根本理念。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思想虽然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整个风俗、伦理、道德、政治、经济、宗教、信仰及文学、艺术等等的思想、观点和看法，但总有一个最根本的理念贯穿其中，并内在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他文化思想观点，影响着他们的整个文化历史价值取向。如印度文化的“梵我如一”思想、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拯救”思想等等就是这样。印度文化从来没有离开过“梵”的思想，整个追求从来没有离开过“梵天”境界，没离开过“梵天”的寂静味儿，没离开过“神我”，没离开过“梵我如一”的思想境界。所以“梵”的思想、“梵我如一”的思想，就是印度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他们文化的根本精神。以色列犹太教的精神、西方基督教的精神等等也是这样。虽然它们也有发展变化，但其核心价值观、其根本精神并没有多少变化。俄国思想家尼·别尔嘉耶夫所说的俄罗斯东正教思想，在精神上由“第三罗马演变成莫斯科王国，以后变成帝国，最后变成第三国际”^①，就是这样一种情况。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俄国思想，不管受西方思想怎样的影响，不论是受伏尔泰、康德、黑格尔的思想影响，还是受马克思的思想影响，它最终都没有离开东正教的思想——或者被东正教重新理解和阐释，或者服从东正教信仰的真理。这就是俄罗斯东正教的核心价值观，这就是俄罗斯的根本精神。

虽然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核心价值观总是和它的文化根本精神联系在一起，但其文化核心价值观，并不等于它的文化根本精神。因为精神的存在是无形无象的，是几微幽深、变化莫测的，是发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的，是良知流行、知觉独照的活动，是忘物、忘我、忘掉一切现实的存在，以虚灵不昧之心，会其玄极，以应无穷的活动。心之所到，神之所往，即是精神。但它不一定是价值观。精神有时是不起念的，是不受意念支配的。而价值观则属于意念的活动，属于观念或理念的活动。只有当精神活动凝聚于某种文化观念或理念，并和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才能成为价值观；只有当精神活动和最高的形上本体存在联系在一起，并成为支配国家民族文化理念的时候，它才能成为最高精神，成为支配国家

^①〔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